

一下子十四个

● 冻

村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陈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一下子四个！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：陈先法

封面设计：周志武

一下子十四个

陈 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8.875 插页 2 字数 142,000

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册

ISBN 7-5321-1122-9/I·841 定价：6.90元

内 容 提 要

写人不易，写人心则更难。

这里，作者以诙谐机智、生动幽默的笔触，将一个个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，有作家王安忆、王小鹰、赵丽宏、吴亮等，有播音员滕佳，有个体户老板和她的老板，有大西北的建设者，乃至劳改农场的犯人……其音容笑貌逼真，其内心世界跃然纸上。

上帝造了一个人，作者将文字又造了一遍。这是一本专门写人的、很有意思的集子，共16篇。

自序

天底下，写人大概是最难的了。有道是“知人知面不知心”，如今的人，面也难知，何况心乎？今日化妆，明日整容，至少也要换一副眼镜，忽儿有形，忽儿无形，再加上变出许多颜色，叫人不敢贸然相认。

譬如本人，好端端活着，不曾隐居。此人的文章说胖大，那人说瘦弱，更有许多互为反义的形容词，直闹得我非照照镜子不知自己的尊容。

可见，写人不易。

写人心则更难。人心隔肚皮，这是古人的认识，以今天的科学，人心至少隔着心包、胸膜、肋骨、肌肉、脂肪、表皮，再加上衣裳。有些衣裳上缀有许多饰物，看得人眼睛花掉。衣裳的内袋正贴在心前的部位，也许有钱一叠，也许有护照一幅，更不说那畜生皮做的真皮皮夹。如此一说，心就像隐在深渊中。

不过，看虽然看不出，心却是可以体会的。所

以,我们不妨写写人。即使写不出全貌,写个一面两面也是好的。就如照片,虽说也是一个平面,靠它,我们还是能认出许多人来。至于正面相之外加照侧面,一组多幅,那是警察局存档之用,或者是明星姿态过剩而致,对我们这些普通的人,免了也罢。

平时我习惯于虚构,生造出一个人,赋予他姓名与经历,容不得他人插嘴。倘若写的是一个活人,甚至还有盛名,别人就可说像与不像。最惊险的是他还要活下去,将我的文章活出破绽,那时我便无地自容了。我虽没说出来,其实也是想当伯乐的,至少看着日行千里的马赞一句,好马!希望它不要偏偏停下来,就地打滚,弄得我就十分没趣了。

至今我尚未看见那尴尬的景象。希望日后也不看到。

不管怎么说,写人还是有意思的,对人对己都不失为一种挑战。上帝造了一个人,我们将他用文字又造了一遍,是不是很有意思?

陈 村

1992年3月31日

•目 录•

自序.....	1
一下子十四个.....	1
话说王小鹰.....	12
有一个王安忆.....	35
大头吴亮.....	52
论陈村.....	62
我认识的赵丽宏.....	83
天真汉马原等等.....	94
记郭建革.....	100
马儿啊，你慢些走.....	105
太原的冯英利.....	112
记严德仁.....	116
回忆滕佳.....	120
好吃阿彭.....	132
老板和她的老板.....	135
你是什么人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你到这里干 什么.....	149
在青海.....	209

一下子十四个

都十二点了,要是不困,就说说文坛,说说和我有点交情和没有交情的文人们。看书是一回事,看人又是一回事。在文学家的辞典里,他们的形象和居民身份证上的照片没有两样。那是准备蒙后人的东西。

这一阵,仿佛到了世纪末,仿佛作家们已集体自杀,由此招来了悼念文章似的印象记们。自传如同遗嘱,在对世人作最后的陈述。这样的活儿我也干过。干的时候心情的确古怪。如今,把身后事都预先办了,就没什么可不放心的了。

迄今,我写过王安忆、王小鹰、赵丽宏和吴亮。其中,吴亮和王安忆值得再写一遍,他们较不安分,不是一遍就能写透的。吴亮的身边总像埋伏着危机。他永远站在十字路口,永远不怎么打量就走进新的路。他有好的胃,能打很响的呼。吃着狗肉鼻血就出来了。有理讲不清拳头就提起来了。这是一个体力脑力均过剩的人。认识久了,

发现他还有一副好心肠，不过，羞于用在汉子们身上。

我见到王安忆时，常常不知和她说什么是好。一直谈文学既累又酸，然而舍此就很少话题。在我看来，她对文学之外所有事物的即兴见解都大有毛病。她实在是一个有点思想并以思想为乐事的人，深思熟虑之后的言辞常常闪光，闪得像手电，像玻璃，像金属。可惜，她将自己包裹得太紧，用豪猪般的硬毛抵御靠近的企图。于是，和她说话容易累着。我常常和她开点玩笑，有时开到纸面上。她通常是大度的。细想起来，我实在是读了她的小说之后才认识她，费一点破译的工夫就认识了。假如没有小说，我想，我们是没有理由认识的。上帝并没将她造成夺目之材，她却为上帝创造了小小的奇迹。文学是仁慈的，听任她从思维的歧路走向正果。

有件事非常奇怪，许多与宗福先毫不相识的人也乐意说点他的坏话。他们凭的是神圣的直感，我就无法为其辩护。再想想，除了他的朋友，人们果然没有理由喜欢他。他不够魁梧，也不雄辩。况且又是落伍者的装束，从头到脚一律平服整洁。操下巴使他的脸总像在微笑。这年头，只有不正经的人才总是微笑。他平步青云，他才质中庸，他总是开会。如果我不是他的朋友，也许同

样不会喜欢他。我热爱他在家中的形象,那时候,他会长吁短叹,会气急败坏,会从某角落变出一盒不追求象征的录像带,会朝嘴里喷平喘剂,会念叨他不能忘怀又无力表现的往事。我曾想写篇文章,《马儿啊,你慢些走》。看完苏联影片《秋天的马拉松》之后,我说他是“双马”。他也许永远成不了第一流剧作家,却是第一流的朋友。后来文章没写,因他成了我的上司。多年前,我认识他时,他不认识我。他为《于无声处》到我校讲演。从那时起,我知道这是一个过于有自知之明的人。自知既明,当戏剧大家就难了。

时至今日,我怀念多年前的时光。那时能一伙人说点文学,即使警惕,即使敌意,即使毫无意义,也强过今天的客气和忙碌。我们成了个体户,游兵散勇,将名字大把大把地抛向社会,魂不守舍。

在我经常想起的人中,有史铁生。其实我并没和他见过面。曾受人之托,写信去组稿,他寄了,并来信要我也写,给《三月风》。我认认真真地答应,一次次构思,却始终没写成。我的文章很滥,但哄谁也不能哄《三月风》。有次到京,想看他却没去成,只好托朋友将蜡制的小鞋送他。他收到了吗?

有路而不能走，能量就回到了心里。我读《插队的故事》，读得心凉。史铁生更有理由成为残雪，但他节制了意念，还在用地老天荒的爱爱着一切，爱得毫不媚气。这样的人，该怎么说他呢？

还有瘦弱的何立伟。他的话软而缓，还常像毛主席教导的用手势加强语势。他爱谈沈从文，爱谈细节而不是观念。我总觉得他是孤孤寂寂的，为此，给他得奖是给错了。我想，他应该住在一条石板路的尽头，门前有着青苔。他该住有院子的平房，最好临着浅水。阳光由树叶筛过，抖落在院中的石凳上。他的生活里要一点老酒，有把蒲扇。

在文坛大规模寻根的前夕，他和阿城小住上海作协的小楼。我去聊天，不料聊到天明。我们轮流说话，一起抽烟。那时，他俩刚得了奖，于是买来洋烟。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。阿城宣讲他“文化小说”的主张，令我获益匪浅。他不笑时颇有仙风道骨，莞尔一笑倒还柔媚。那晚上，我说要写大象。事后，阿城竟记得寄来说象的书，这样看，他又是儒家了。

初识阿城在杭州的会上。他穿着合体的中式棉袄，坐我旁边喝酒，喝黄酒。那晚他有点兴奋，频频与人干杯，一杯杯地喝着，非常豪爽。我问他喝没喝过这东西，他说没有，说像汽水一样，好喝。

我告诉他黄酒性子慢，也会坑人。阿城还是干杯，和为他“改错别字”的《棋王》责任编辑干杯。酒后，众人纷纷离座，阿城走得更加飘逸。走着走着，双腿半蹲，两手搂着柱子转圈。我以为他又要出什么洋相。后来，果然出了洋相，人事不省地被李陀和郑万隆抬将上楼，抛在床上。第二天见他，已换去中式棉袄，穿着借来的洋装，另有一种派头。他再不喝黄酒。

事后，我有点纳闷，阿城怎么能没喝过黄酒呢？

同样没见过面的还有莫言。他和我共同的朋友崔京生很愿说点莫言。说，对我不起大的作用。读莫言的小说，渐渐读出他是个很自卑也很压抑的人。他放肆地自我扩张，扩张到故意叫人讨厌的地步。不过，总没法鄙视莫言，因他的小说始终有平民的正义。这叫莫言变不成土地庙。同样是平民，读梁晓声便差得多。他过于关心权势，过于用仇视来掩饰无缘的失落。莫言以自卑而独立；梁晓声由激昂而怯懦。我同样没见过梁晓声，有次同在一个会场居然也没见着，可见是无缘。说他和说莫言一样，都是猜测，没有作品之外的根据。

既然说到北京，就讲张承志。他是不容忽视

的。我和他算不上朋友，见过几次面，说过几句话而已。人们很容易看出，他是一个有力有信心有信仰还清高的作家。也许他还有矛盾。记得他刚从日本归来时说过，以后不写短篇也不写草原。写短篇太累，草原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，他说自己插队去错了地方。那天，《文汇月刊》的编辑向他索要照片，要登封面，张承志一再拒绝。后来，我又读到他写草原的短篇，写得还是很好。也看到他坐在封面上，很像学者，但搂着书的手有点紧张。

我曾冒失地对他说，觉得《胡涂乱抹》很像他。他说了三个字：“像中国”。那是一个十分焦灼的短篇。我和他的对话多半就这么一来一回，从不投机。他从不接受冒犯，而我总是冒犯他人。也许因自己身上也有回族的血统，我想我是能理解他的。他像回民。我爱读他的《阿勒克足球》，《黑骏马》。爱读他的小说而不是散文。我总觉得，他是中国当代有数的离大家一步之遥的小说家。他将为此永无宁日。

同样不受冒犯的还有马原，他是我的朋友。认识他时他已写出《夏娃》和《零公里处》，但没人给他发表。我留他吃了便饭，他不认识算。认识算以后的马原渐渐于在野文学中有了点名气。李陀

和杨晓敏、肖元敏等人想方设法要发表他的《冈底斯诱惑》。马原的运气渐渐好了起来，他渐渐自信多了。他读过的长篇无计其数，最终读剩一部《红字》。目前，他自称是有小说以来最好的小说家，在小说上已入化境，无所不通，无所不能。说这话时，他绝对认真。我一下子想到林彪的《再版前言》。我说他无耻得可爱。他无疑是个很优秀的小说能手，却不是个做广告的能手。那晚，他留宿我家，真诚地指出我这五年白活了，说我是一流小说家写出三流作品。我笑笑。马原实在是有几分天真的，因此，说什么都不叫人讨厌。他过于迷恋地想确定自己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，并希望听到他并不以为然人士的首肯。这是马原的悲剧。他想得太早了。这件事海明威是在江郎才尽时做的。马原的杰出在于他重构了小说的世界，这是很“现代派”的。但“现代派”小说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写出代表作之后，作家的去世与否已和艺术无关。马原的焦灼是因为这个么？

如今，马原被评论家认为是写小说的专家。“专家”一词的科学意味过于浓厚，似非吉兆。我至今不能确定，马原的小说是否够得上心灵也十分伟大。这么说，马原不必自暴自弃地刻什么墓志铭，活路还很长。

接着很想说王蒙,和人们一样,用字面整洁的词说。

王蒙是常在人嘴边挂着却最不好说的作家。无论赞赏还是诽谤,我没听过一个人说像的。王蒙可作为智力测验的一道保留题。我在近处看过他,听过几次他的报告,同他说过几句话,承他记得我。印象是他的智商极高,反应奇快,极懂中文。在一个不方便说话的时节,他曾谈笑风生且慷慨激昂地在台上讲了两个小时。我是听众,听完后一想,竟想不清他说了什么。

在阵容庞大的中年作家群中,王蒙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。他甚至充当过如今先锋派青年的先锋。用典型论,他是这代知识分子经历和心理的样板。他敏感,机智,大度,中庸,常葆活力,不满现状,承认客观,怀旧,热爱生命,自省但不忏悔。一下子很难说全,即使用王蒙式的语言也难概括。有些对立的因素在他身上异常协调。“大智若愚”或“大愚若智”都不稀罕,王蒙却是个“大智若智”型的人。这样的人没见过。

我经常读他的小说,爱看不爱看都有。无论今后有怎样的艺术评价,我以为,他笔下的中国中年知识分子最为传神。他的散文集《访苏心潮》使我顿时懂得很多。他将很难的题目写得如此之……。我斟酌用词,用“好”用“妙”都不贴切,应说“写得

如此之合适、合情”。王蒙传布的观念可能过时，他委婉伤悼敏锐激奋中庸有时也不免饶舌与世故的描述将余音绕梁。

假如日后我改行专写传记，很愿写写王蒙。他对写传的人无疑是个圈套，还是诱惑。

他是多金属共生的富矿。

我还想为之写传的是曹冠龙。写他相对容易些，我和“作家”往来，同他在一起的时间最长。他在四十岁时，自费赴美读学士，至今尚未学成。走的前一天，来和我话别，包里放着刚买的几个鞋掌。他穿着翻毛工作皮鞋去美国，并带了备用鞋掌和胶水。他原本是工科中专生。

看过他写的《门》就知道，他是个从生存绝境中走出来的人。但他不企求同情也没人会同情他。他总是扮演强者，常扮演到自以为是强者。他嫉恶如仇。他自以为是。他假充谦恭。在去四川、去海南岛采访的一路上，我与他争吵不休。责任多半在我，我是个很扫兴的人，常把有趣的事闹成无趣。他说，连他这个作家也读不出的字，应一律从字典划掉。我说，你将曹冠龙的“冠”读成“官”，是否也要划掉？划掉后你就成了“曹龙”。他指着大片荒地，指责为何不修水库。我问他知道此地降雨量蒸发量是多少？地下的基岩什么成分？

是不是多地震地区？等等。向来以尊崇科学为己任的曹冠龙无疑恨我之极。在一起久了，我看明白他怀着很深的力不胜任的恨，藏着想凌驾一切之上的潜意识。据我所知，自出生到和我告别的那天，他没有获得渴望的幸福。我不清楚的是，美国可曾给予他补偿。

他常爱捏着那块“残忍的下巴”做沉思状，拍照时尤其如此。其实，他的本性异常善良甚至懦弱。他信鬼也信命。他似乎总是不断地教导自己，符合真善美的规范。他的正义感强烈得几乎盲目。他是个极端分子，与中庸无缘。是个认真得偏执的人。是个热爱自我又鄙薄自我的人。这个人这会儿是没法将他说好的。我很希望他能回来，再一起漫游，一起争吵。他走后，我独自去青海的戈壁，寂寞中，许多次想起他。有人曾说我是他的“克星”。曹冠龙一生的克星太多了，想到这些，先生还是不出来漫游也罢。

昨天，和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滴着幸福的许子东副教授打电话，他告诉说离香港前和北岛吃过一餐饭。文人的习气，见面能同吃同住，分别则杳如黄鹤。

我在一九八〇年认识北岛并知道他叫赵振开。他想使我的小说译到一本官办的杂志上，被